

20 世纪《金瓶梅》海外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许云瀚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本文主要关注 20 世纪日本与欧美学者对于《金瓶梅》的研究。指出日本学者虽长于搜集文献,考证源流,但对于成书年代等考订却过于死板;欧美学者擅长运用西方文艺理论解读小说,缺点是常把理论预设置于小说材料之前,其称引的理论也与中国传统的小说批评有暗合之处。

关键词:《金瓶梅》;海外研究;回顾;反思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27-0003-02

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0.27.002

一、引言

20 世纪的《金瓶梅》海外研究大概形成了两个中心,一是以日本为中心,一是以欧美为中心。日本的代表学者有小野忍、日下翠、铃木阳一等人,他们在成书年代、版本、影印过程等基础文献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欧美的代表学者则有夏志清、韩南、浦安迪、柯丽德等人。这些欧美学者有的重视不同版本之间的区别,例如韩南的《韩南中国小说论集》曾特别关注过《金瓶梅》的手抄本,而浦安迪则比较注重万历本和崇祯本的各自特征。另有一部分欧美学者比较注重对小说意蕴的探究。其中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对《金瓶梅》的解读更接近于传统的对故事情节和故事含义的介绍;而其他欧美学者则采用西方文论的一些视角方法进行文本分析,例如浦安迪和柯丽德,他们以古代评注去探究文本内涵,并且采用语言学的某些方法对《金瓶梅》文本语言的隐藏意义进行探究。总之,日本学者和欧美学者的研究方式各有所长,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他们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也可帮助我们在新的视角下对《金瓶梅》进行研究。

二、收藏与考证——以多位日本学者的研究为例

在《金瓶梅》的海外研究中,日本学者比较重视《金瓶梅》作者、成书年代、版本等基础层面的研究,在文献方面有重要价值。日本学者经常会在论文当中提到一些流落海外的《金瓶梅》文献,这就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比如小野忍在他的文章《〈金瓶梅〉解说》当中就提到日本的日光轮王寺“天海藏”藏有题名《金瓶梅词话》的本子,此外京都大学和其他一些日本大学也藏有一些残页。学者长泽规矩也从“日光轮王慈眼堂藏书目录抄出”发现了有关“金瓶梅诗话十六卷”(他指出此版本与东京毛利氏家藏本一致)的记载。我国学者王古鲁也正是在轮王寺影印了大量古书,由此传播到中国。(长泽规矩也有篇文章就叫《〈金瓶梅〉影印的经过》,详细介绍了王古鲁影印的过程,但是其中难免带有对中国人的偏见和狭隘的民族色彩,比如他称王古鲁的影印这种“死乞白赖和厚脸皮的行为实在令人为难”。)此外鸟居久晴的文章《〈金瓶梅〉版本考》等论文则对“词话本”和“小说本”等版本的源流系统进行了细致的整理考辨,堪称经典。鸟居久晴关于《金瓶梅》的版本接连写了四篇专门论文,分别是《〈金瓶梅〉版本考》、《关于〈绣像金瓶梅〉》、《〈金瓶梅〉版本考再补》、《〈金瓶梅词话〉版本考补说》。这几篇论文介绍了词话本最早的源头是万历丁巳序的北方刻本,而且指出这个本子是 1933 年北京的一个书店在山西省发现的,后被北京图书馆收

藏。另外,鸟居久晴对当时翻印这个原始版本的影印书目也进行了梳理。鸟居久晴又指出慈眼堂藏书也有一个万历丁巳本,虽然这套书秘藏不对外人开放,但是鸟居久晴还是点明这套书应该是崇祯年间出版,与北京图书馆的藏本是异版。日本学者对于文献版本考证的朴实学风和注意细节的精神令人敬佩,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学者经常相互之间进行信息交流,比勘版本,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补充。例如在长泽规矩也发现《金瓶梅》慈眼堂藏本和毛利本一致之后,又有人把这两个版本和鸟居久晴提到的北京图书馆藏本进行比较,发现毛利本居然又与其他两个版本有细小差别。接着日本学者上村幸次便又对毛利本的流传进行了一番梳理,题名为《关于毛利本〈金瓶梅词话〉》。

由此我们发现,日本学者对于《金瓶梅》版本的研究是拼图式的,他们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补充,从而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更加完善。

在日本学者中,日下翠的论文《〈金瓶梅〉成书年代考——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批判〉》颇有特色。对比吴晗和日下翠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学者研究思路的相似,也能看出中日两国学者在类似的研究思路下,征用文献材料的差异性。吴晗根据《金瓶梅》当中“马价银”内容,对照《明史·兵志马政》的相关记载,推断《金瓶梅》成书年代大约在万历年间。而日下翠则采用《明实录·世宗实录》当中关于“马价银”的记载,推断出《金瓶梅》大约在嘉靖时期出现,他指出,“《金瓶梅》中的马价银问题,与其说是反映了借用已经慢化了万历年间的事情,还不如说是反映了具有临时刚增加的嘉靖年间的事情比较自然”。^①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在推断《金瓶梅》成书时间时,我们究竟主要依据《明史》记载为主,还是依据《明实录》?两者似乎都可靠,但实质上又都不可靠。因为日下翠和吴晗虽然对历史材料的选择不同,但考证思路是一样的,即都是根据小说中反映的历史现象去比对历史记载,由此推论出成书时间。但是小说文本却不是精确的当时的历史材料汇编,小说反映的历史现象是广阔的、模糊的,与历史记载的精确性相悖,这是用历史材料对比小说叙述的基本矛盾。事实上,日下翠的论文中也点到“马价银”在嘉靖之前的成化、弘治年代已经出现,那么他断定《金瓶梅》反映的是嘉靖年代情况似也有不妥。与此类似的考证还有对书中“宦官”和“佛教”现象的考辨。吴晗和日下翠都在根据《金瓶梅》当中宦官和佛教问题表现的严重程度来对应一定的历史时期,但是宦官当政、佛教的流行在明代中后期一直存在,

我们很难界定哪些阶段是问题的“严重时期”，哪些阶段是问题的“缓和时期”，由此推断出小说出现的历史时间也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日本学者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为我们提供不同的文献视角，让我们能看到《金瓶梅》成书年代的多种可能性，并且进行更精确的断代。例如吴晗根据《万历野获编》，把《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下限断在万历三十四年。但是日下翠则根据袁宏道给董其昌的信将断限远远提前，这就显现出日本学者运用文献的灵活性，值得我们借鉴。

三、结构与语言——以浦安迪、柯丽德等人对《金瓶梅》的研究为例

与相较于日本学者，欧美学者对《金瓶梅》的研究呈现出多点开花的面貌。其中韩南注重版本与素材来源研究，与日本学者的研究有重合之处。法国汉学家雷威安和美国汉学家芮效卫则致力于《金瓶梅》的译介。而浦安迪和柯丽德则立足于结构、意象等西方文论概念对小说展开解读，给人比较大的启发性。浦安迪的创见在于对《金瓶梅》结构的分析，他看到了小说的篇章结构和意象结构。浦安迪敏锐地注意到《金瓶梅》“定型的100回长度问题以及这‘百’字所暗示的各种潜在对称和数字图形意义”，“小说叙述的连续统一性也常被划分成很有节奏的10回一单元”。②“节奏”、“对称”、“连续”显然是带有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色彩，这种阐述使《金瓶梅》披上了后现代小说的色彩，让人联想到西方种种结构环环相扣的小说。浦安迪一直热衷于探求这些章回数字背后的密码，因为他看到了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中所提到的“100回是1回”这种说法。事实上，浦安迪在解读《金瓶梅》的过程中借助了很多张竹坡评点的帮助。相对于小说的篇章结构，在更深层次上，浦安迪提出了《金瓶梅》中的“意象结构”这一概念，这同样收到了张竹坡评点的影响。张竹坡有《金瓶梅》是“炎凉书”的说法，浦安迪则注意到了《金瓶梅》冷热意象与琐屑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与冷热意象的变化与人物活动相始终，不断循环，由此形成一种意象的“迭代结构”，也暗示着小说故事情节的走向（比如浦安迪注意到西门庆要去狮子街李瓶儿的住处过节，而狮子街恰巧是潘金莲谋害武大的地方）。而且浦安迪热情地为张竹坡的评注方式进行辩护，尽管张的评注方式为中国传统保守的评注所不容。

但同时我们不仅要反问：浦安迪承认中国小说评注的伟大，同时又在张竹坡的启发下进行现代视角的观察，那么这是否反证了中国小说评注作为文学评论的独立性及其与小说本身水乳交融的关系？那么我们真的还需要用现代西方文论的方式去解读中国传统小说吗？

与浦安迪的研究类似，柯丽德也注意到了《金瓶梅》意象、语言表述所带有的丰富意蕴。但是她并不像浦安迪从语词引申出意象结构的概念，而是把这种现象处理成一种语言的隐喻，由此她把《金瓶梅》中的一些语词、句子称之为“Puns”（双关语）、“Puzzles”（谜语）（从语言视角入手，把《金瓶梅》的意蕴问题处理成语言隐喻，这是柯丽德的新颖之处，不过她的研究思路与浦安迪的“意象结构”基本一样，而且浦安迪的“意象”表述似乎也比柯丽德的“语言游戏”表述更接近中国文学的本真）。

柯丽德有一篇代表论文《Puns and Puzzles in the Chin P'ing Mei——A look at Chapter 27》，在论文开头她就旗帜鲜明地表现出对《金瓶梅》语言艺术的关注：“The verbal games in the Chin p'ing mei make the text a delight to read, and they engage us whether or not we accept the book's

traditional remedies for social ills.”（英文引文均引自后文的参考文献中对应的论文，下同）这种对“语言游戏”的关注已经超越了读者对小说本身社会意义的重视。柯丽德也提到书中日常生活出现的琐屑意象。与浦安迪一样，她在张竹坡的引导下注意到了小说当中对“冷”和“热”的描述，他们都看出来冷热不仅代表自然的更替（这似乎代表着外国学者对《金瓶梅》文本的直观感受），更代表人类家庭的兴亡。除了“冷热”意象，柯丽德把书中人物进行的日常活动本身就看成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即腐坏堕落的家庭象征着日渐衰落的国家。柯丽德在其论文《Family, Society, and Tradition in Jin Ping Mei》中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在此不再赘述。她指出，西门庆在效仿国家上层贵族的所为，西门庆的仆人又在效仿西门庆，每一个下层阶级都是上层阶级的象征，所有阶级又都在破坏着儒家价值观。她甚至认为西门庆不同出身的六位妻子象征着明代政府六部，这就有点牵强，明显是在使小说材料符合自己的理论预设，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

四、结语

总而言之，2000年之前的《金瓶梅》海外研究流派清晰，思路明确，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样式，许多观点对我们的研究是有启发性和指导性的。不过我们也需要发现其局限性，并且参照我国传统的古代小说批评，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研究《金瓶梅》。

注释：

①王国安，黄霖编译. 日本学者研究《金瓶梅》论文集[M]. 济南：齐鲁书社，1989：125.

②[美]浦安迪. 明代小说四大奇书[M]. 北京：三联书店，2006：59.

参考文献：

- [1][美]夏志清.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 [2]王国安，黄霖编译. 日本学者研究《金瓶梅》论文集[M]. 济南：齐鲁书社，1989.
- [3]温秀颖，李兰. 论芮效卫《金瓶梅》英译本的体制与策略[J]. 中国外语，2010，7.
- [4][日]鸟居久晴.《金瓶梅》版本考[A]. 日本学者研究《金瓶梅》论文集[C]. 齐鲁书社，1989.
- [5][日]日下翠. 金瓶梅作者考证[M]. 明清小说论丛//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 [6][日]日下翠.《金瓶梅》成书年代考[A]. 日本学者研究《金瓶梅》论文集[C]. 齐鲁书社，1989.
- [7][日]大塚秀高. 金瓶梅的构思[J]. 明清小说研究，1996，4.
- [8][英]韩南，王秋桂译. 韩南中国小说论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9][美]浦安迪，沈亨寿译. 明代小说四大奇书[M]. 北京：三联书店，2006.
- [10][美]浦安迪，陈珏翻译整理. 中国叙事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11][美]浦安迪.《The Chongzhen Commentary on the Jin Ping Mei: Gems Amidst the Dross》，From,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Vol. 8, No. 1/2 (Jul., 1986)
- [12][美]浦安迪.《Chang Chu-p'o on How to Read the Chin P'ing Mei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From,《How to Read the Chinese Novel》，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下转第94页)

感的带动之下,拉近了观众与节目的距离。例如,在第二季节目中,冠军选手艾热的一首《乌云中》,引起了热烈的情感共鸣,获得了观众的一致认可。《乌云中》是艾热写给爱人的一首情感格局,歌曲以“挽回自己的爱人”为主线,实现了情感元素的充分展现。因此,一首歌曲能够被听众喜爱,不仅应具备优秀的编曲与歌词,更能打动听众内心的是蕴含在歌曲之中的情感,在听完歌之后受众亦能体会到歌手的创作心境与感情,实现情感共鸣。对于一档综艺节目,情感是不容或缺的重要元素。

《中国新说唱》抓住了观众的情感所需,在节目效果与音乐技能的双重展现中,提高了节目的成效效果,获得了观众热烈的情感共鸣。随着《中国新说唱》节目的不断发展,关于音乐选秀与情感共建的节目效果正不断体现,这正成为该档节目的亮点所在。《中国新说唱》正以强大的文化传播力,影响着年轻群体,为节目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创设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四、注入节目理念,植根中国文化

《中国新说唱》在对节目的定位中,就是将其作为“中国首档Hip-hop文化推广节”。作为一档新的节目形态的创设,让不少华语年轻说唱歌手参与,不仅提高了选秀节目的质量,同时也以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实现了节目效果的有效创设。

首先,在节目打造中,通过严谨、丰富的节目形式进而,在多样化的音乐作品中实现了对说唱音乐文化的传递,同时也更加强说唱音乐的本土化构建,在中国文化及元素的融入中,让音乐的中国风更加浓厚;

其次,说唱音乐文化以年轻群体为主,节目在文化传播中,将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为主线,传达出的价值观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一档具有“正能量”的综艺节目;

再次,传达最有年轻人态度和价值主张的《中国新说唱》成为最具差异化、最具创新力的一档超级网综,在说唱文化植根于中国提供了重要载体。

因此,在《中国新说唱》的节目设计中,其创新亮点不在于有多么华丽的场面及明星阵容,更多地是在节目理念的践行中,将

中国优秀的文化元素、积极向上的文化品质在节目中进行传达,这体现了节目的理念追求,也契合了中国文化,这决定了《中国新说唱》的成功与否。节目总监陈伟在一次采访中强调:“《中国新说唱》不追求哗众取宠,在追求音乐品质的同时,也更加注重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引导,让观众从喜爱文化、引领时代精神潮流中认可节目,这是《中国新说唱》节目成功的内在需求。为此,在《中国新说唱》的节目创设上,本土化、大众化的发展,成为节目植根于中国文化,展现文化艺术传播力的关键。

五、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如何围绕文化构建更具中国属性的节目,成为音乐选秀类节目创新发展的重要出发点。《中国新说唱》作为一档成功的音乐选秀类节目,其成功的核心在于紧扣“中国”的本质属性,在文化等元素的吸纳与融合中,形成了更具创新性的节目形态,获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

《中国新说唱》跳出了传统音乐选秀节目的禁锢,通过“文化+”的方式,将说唱音乐与中国文化元素有效融合,碰撞出新的火花。对于新的时代环境,综艺节目的创新要植根于优秀的文化,从中国文化、情感等要素的融合中,促进了《中国新说唱》的创新设计。

参考文献:

- [1]刘诗奕.中国电视音乐类选秀节目的发展与创新[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旬刊),2018,11(12):17-18.
- [2]金铮.《中国有嘻哈》的文化定位及特点[J].当代电视,2018,(05):14-15.
- [3]杨毅彬.音乐类电视选秀节目同质化的现状、原因与对策[J].音乐时空,2018,14(02):168-169
- [4]孟越.从音乐选秀节目《中国有嘻哈》看我国嘻哈音乐的本土化演变[J].西部广播电视,2017,(24):109-110
- [5]陈灵.中国音乐选秀节目的发展与创新之路[J].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2019,4(09):115-116.

(上接第4页)1990.

[13][美]浦安迪.《金瓶梅》非“集体创作”[J].金瓶梅研究,第2辑.1991.

[14][美]柯丽德.《Puns and Puzzles in the Chin P'ing Mei——A look at Chapter 27》,From,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67,

Livr. 3/5(1981).

[15][美]柯丽德,《Family, Society, and Tradition in Jin Ping Mei》,From, Modern China, Vol. 10, No. 4, Oct., 1984.

[16][法]雷威安.《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三、五十四回的秘密[M].国际金瓶梅研究集刊第1集.成都:成都出版社,1991.